

治理整顿中的经济与财政

许毅 著

治理整顿中的经济与财政

许 毅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沈 莹
责任校对：刘 萍
封面设计：张卫红
版式设计：代小卫

治理整顿中的经济与财政

许 毅 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8.75印张 206000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058-0430-8/F·348 定价：4.50元



作者简介

许毅，字仲华，1917年11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学徒出身，做过店员。1938年参加革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做财经工作，先后任县财经局局长、专署粮库主任、行署粮食局局长、实业公司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预算处处长、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副司长、基建财务司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十年动乱期间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任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安经济财会咨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和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咨询员、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总干事、中国税务学会顾问、中国投资学会顾问、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实行学位制度后，担任财政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金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1987年6月被收入《经济日报》主编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第2册。1988年9月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协会选举为该会年度会员，并被收入《国际名人辞典》第21版中，同年又经国际传记协会理事会决定，被收入未来每一版《世界名人录的荣誉册》。

序 言

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国际风云变幻的震荡中，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制止了动乱，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粉碎了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复辟倒退阴谋，抵制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制裁。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决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决采取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措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克服了经济过热的倾向，抑制了连续5年的急剧通货膨胀。虽然出现了结构性的市场疲软现象，但1990年的工业生产仍取得了稳健的增长，农业获得大丰收，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国民经济建设胜利地完成了第七个五年计划任务。

这些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方针以及为深化改革而采取的治理整顿的措施是正确的、不可逆转的。

这一系列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社会主义是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是人类争取解放的代名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走向人类解放的起点，是一切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战士为之奋战、为之捍卫、为之献身的动力。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伟大的实践，它必须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

抽出来,又在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理论。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①我们知道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历史活动的产物。所以,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但是,常常有一些人,离开生产力再生产的规律、离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律、离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去研究生产关系的变革,离开经济基础去研究上层建筑的职能作用。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不作历史的分析,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忽略了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会忽略社会制度的不同性质,以致许多善良的人们把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搬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来。比如,把马克思批判过的萨伊生产三要素论用来篡改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理论,实质上是用资本创造价值来篡改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把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等价交换、供求规律)同资本主义特有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机制,即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两眼向钱看的资本机制相混淆。由于概念不清,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论,以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我认为进行科学探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页。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从发展中考察一切历史现象。因为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进行研究时，不应当从“永恒正义”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曾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因之，我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承担着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三重任务。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的国情，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艰巨复杂而又困难的。所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革命斗争中、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改革开放中，出现一些失误和曲折，特别是国际共运中出现了曲折，都是难免的。但是，决不能据此来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有些人看到这些失误和曲折，就怀疑马列主义是真理，怀疑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别有用心的人）。我认为，我们的一些好心的同志，首先是没有学好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没有弄清楚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没有弄清楚生产力再生产规律和生产关系再生产规律，也没有弄清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更没有弄清楚在同一个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生产关系多层次性（即不同经济成分），这种不同质的生产关系是不能相加的，但又必然产生某一种生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产生的生产关系总和、形成了某一社会的成为普照之光的生产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各该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经济规律体系。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生产方式下共同存在的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交换方式和它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和一切今天决某些国家所恣意滥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论断比拟。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①“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②

现在我们理论界，常常把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经济不加分析地混同起来。把共性与特性混淆起来，就弄不清它在不同生产方式下质的区别。

我认为，我们理论界的同志和从事实际业务的同志，目标是一致的，愿望都是好的，之所以出现分歧，主要是在方法上。我想只要我们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定会取得共识的。我想还要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搞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搞的四化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是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占绝对主导地位；二是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国各地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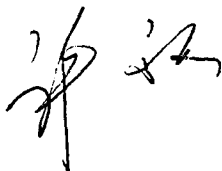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③ 引自《人民日报》1985年8月30日。

我这一本集子中收入的文章，是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以来的两年中所作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这是为了与同行专家交流观点，向同行专家请教。交流才能求得共识，才能共同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探索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之道，为顺利实现八五计划、十年规划作出贡献！

在本书编辑出版中，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余天心同志和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柳靖、杨照南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经济科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陈惠' (Chen Hu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1990年12月20日

目 录

序 言	1
治理整顿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
坚持·探索·发展	30
正本清源 当机立断 深化改革 摆脱困境	64
调整结构 完善机制 提高效益 走出困境	81
增强国民经济的造血机能与三位一体的改革	98
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103
澄清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几个理论原则问题	113
对突破农业徘徊的若干思考	138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端正指导思想 深化企业财务 改革	157
加强成本核算 健全经营承包责任制	171
论经济效益与成本管理	185
论分配不公	193
防止经济滑坡 克服流动资金人为紧张局面	212
运用市场机制 控制市场 组织市场 领导市场	218
战略物资专营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键	223
实事求是 追求真理 服从真理	230
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235
从一般到特殊地再认识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	245
结构制衡是社会生产力顺利发展的关键	251

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合理规划

国民经济结构的基础256

保卫社会主义国有资产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

基础259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263

治理整顿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

当前国民经济中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生产滑坡、市场疲软和经济效益下降。有人认为这是财政金融的“双紧”政策紧缩了购买力而造成的。我不赞成这一看法，因为近年来我国居民的购买力一直是很旺盛的。1989年，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了经济停滞，这是不作认真地分析、凭主观想象得出的结论。我们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才能正确认识目前的经济形势，弄清楚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的深层次矛盾。我认为，必须正本清源，端正方向，加大治理整顿的力度，才能争取财政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

一、从历史的回顾看国民经济困境产生的背景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了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调整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调整了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调整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了发展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1979~1983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地增长，市场购销两旺，财政收入有较大提高。虽然在1979年和1980年间，因改善人

民生活、调整价格的影响,产生了财政赤字,但经过全党的努力,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取得根本性的好转。大家公认,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一些同志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了。在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尤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没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抬了头,进而出现了理论上的混乱。特别是有一些同志混淆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的性质,崇拜自发机制,反对计划经济,宣扬“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金钱拜物教意识。这些同志误解了列宁关于有商品交换的地方就有市场的论断,把凡是需要通过市场交换商品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当作“市场经济”,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从而导致用资本增殖机制替代社会主义经济责任机制的错误倾向不断发生。事实上,有市场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这种在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夺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形态,虽然仍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则是完全与商品经济的一般原则相对立的。在那里,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使资本增殖,资本对劳动力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它所依据的是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则是依据平均利润率规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条件下,其依据的是超额利润规律和弱肉强食的规律。而我们党提出的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重视发展商品经济的方针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因为,坚持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本质上则是生产社会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比例越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我们社会主义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是指发展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其应遵循的是等

量劳动交换等量产品的原则，也即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我们要遵循的只能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称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即等量劳动交换等量产品的等价交换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

弄错了社会经济性质，就必然导致否定计划经济的错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仅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部门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要把社会劳动必要的比例量分配使用在不同类型的商品上。我们知道，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否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所以，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必须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把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这种自觉的计划性就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自身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科学论断的依据。之所以说以“有计划”为主词，就是认识到越是生产社会化，就越需要加强计划性。这实际上就是针对摆脱资本桎梏，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说的。计划性就是指自觉遵循经济规律的预见性，以及自觉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动性。当然，这里存在着人的主观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问题。因此，我们说的计划性，是要受能见度和能控度制约的。而且，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复杂条件下，这种能见度和能控度是会受到限制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革计划工作和计划管理体制，逐渐完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改革计划工作和体制，是为了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大系统，不太容易把握，加上过去的计划工作中发生了一

些失误，计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就认为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加以正确认识是很难的，对于要自觉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也认为是做不到的，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否定计划、否定综合平衡的错误倾向。这样，在批判“主观唯意志论”的同时，就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否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否定了人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可驾驭性，崇拜自发，崇拜市场，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天生的以增殖为根本属性的内生机制（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是已经消失了的），从而把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市场（凡有商品交换的地方都是市场）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属性的市场经济混淆了。于是一时间把“市场经济取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具有特定社会主义内容的范畴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了，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已经消失掉的资本、资本增殖等经济范畴又与货币、资金（货币不等于资本）等同和混淆起来了。这种理论认识上的迷误，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在改革开放方针的实际执行中，扭曲了原来的正确指导思想，并被有意识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利用。这是近年来发生思想混乱的原因，也是经济秩序紊乱的原因。这种思想上的滑坡必然带来经济的滑坡。

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各方面都有反映。比如在理论上，用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理论）来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混淆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论”（即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又如在金融领域内，出现了一种错误导向，即把原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手中主管流通领域的职能机构——银行，变成了经营货币的企业。把货币变成“经营对象”，实际上把

货币资本化了。作为资本化的货币，就必然要求增殖，银行的经营管理就必然以赢利为唯一的目标。这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正是在这种“货币资本化”、“银行企业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各地纷纷提出发育和发展“资金市场”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专业银行的分工被打乱了，工商银行下了乡，农业银行进了城，中国银行上了岸，建设银行多功能，只要利率高，什么项目都可以贷。与此同时，各省市也都普遍成立了财务公司，甚至有些地方出现私人钱庄和摇会。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机构出现了，向社会争夺存款，又抢先贷款。只要能争到存款，可以不顾“血本”。然而，资本增殖机制对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和职工都是不起制约作用的。所以，这种做法的结果，不仅没有产生有些同志所“预期”的以资本增殖为内容的自负盈亏“硬约束”机制，反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同社会主义的经济责任制脱了钩，负盈不负亏。既无责任，又无风险，于是就发生计划不要了，产业政策不要了，技术政策不要了等自由化现象。1984年甚至出现了几家银行抢着向企业提供贷款的现象（有人称之为“几家抬”）。于是银行的贷款规模在迅速地增长。1984年银行的贷款总额达到4419亿元，比上年增长988亿元，增长了30%；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当年社会总投资额达到1832亿元，比上年增加402亿元；货币发行量增长过多，流通中的货币达到79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03亿元，增长47%；同时，外汇结存也大幅度地下降。由于每100元投资中有40元左右是用于发工资和购买地方材料，而地方材料又主要是砖、瓦、沙、石，依靠人工挖掘，所以，基本建设投资中就必然会有一部分直接转化为消费基金。这种用信用膨胀的办法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积累和消费的“双膨胀”，从而导致财政和银行的“双赤字”，其结果就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